



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

——刘沅与清代新理学的发展

赵均强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

——刘沅与清代新理学的发展

赵均强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刘沅与清代新理学的发展 /
赵均强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215-04840-9

I. ①性… II. ①赵… III. ①刘沅 (1768~1855) —
哲学思想—研究②理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9.9②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802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75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四川思想家研究丛书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 2010 年重点项目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杨永明

编 委 刘国强 黄玉顺 何 一

蒋德均 骆凤文 肖德芳

王水龙 李 蕾 邵 明

张 波 黄 红 段可人

内容简介

唐宋以来,性与天道渐成儒学讨论的中心话语,这一点,即使乾嘉时代也不例外。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虽有差异,但在天人、理欲问题上,貌似天人合一,实则天人、理欲对待。理学发展至乾嘉,学者主张即训诂而明道,遂开辟出一套天人合一、理欲合一的新理学观念。刘沅新理学出现在嘉道之际,其学深究天人性命之理,会通三教,归宗孔孟,以中道为权衡,以心性为急务,修身为本,本末一贯,大有可观。

总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四川思想家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持的、连续出版的大型学术研究丛书。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作为主要从事四川历代思想家研究的学术性机构,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和宜宾学院共建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受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四川省教育厅委托,负责编制、发布和评审有关“四川思想家研究”方向的课题;策划、组织重大科研项目;承办或主办省级以上相关学术会议;编辑、出版、发行《思想家》辑刊;举办“思想家论坛”学术讲座。研究中心旨在以唐君毅研究等现代新儒家研究为起点,进而研究历代四川思想家的思想历程和学术贡献,探讨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及其源流演变,努力凸显四川思想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历次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于2004年,其前身为宜宾师专“唐君毅研究室”(2000年)、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2001年)。研究中心已经出版了唐君毅研究方面的《唐学丛书》第一辑五种六册,今后将陆续推出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今又出版《四川思想家研究丛书》,当然是指除唐君毅研究以外的其他四川思想家研究的学术成果。此外,研究中心的刊物《思想家》也已经出版到第三辑。屈指算来,十载耕耘,真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

自研究中心成立之日起,我本人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今承蒙研究中心主任杨永明教授邀我做序,我就借此机会发表一些感想吧。

记得当年研究中心成立之际,时任研究中心主任的何仁富教授与我曾在秀丽的“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的江边夜品香茗、纵论国学,

共同谋划研究中心的学术发展方向。我们当时所取得的共识是：以唐君毅研究为根基，以新儒家研究为翼展；立足于四川思想家，扩展到全国思想界；采取广义“思想”概念，兼顾古今人物思想。例如所谓“四川思想家”，就不仅仅指“川籍”思想家，也包括所有曾经与四川有过某种密切关系的思想家。这样一来，研究的对象就不限于狭义的川籍思想家了，研究成果的意义及其影响也就不限于四川省内了。

研究中心后来主持招标的课题，编辑出版的《丛书》、刊物，以及开展的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传播活动，都是上述规划精神的体现。也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心广泛集结了全国及海内外众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不仅在四川省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而且在全国及海内外学术研究界也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鉴于《丛书》是研究思想家的思想的，我就侧重谈谈关于“思想”的问题吧。

法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来华访问，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谈到：“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圈外的人听了这话，自然是很不高兴的；甚至圈内的人听了这话，也显得义愤填膺。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若是这样，德里达就是在赞扬中国啊！这是因为：德里达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那么，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哲学这种“宏大叙事”未必是什么好东西，倒是应该予以“解构”的。不仅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显学的现象学也有这样的看法，例如德国著名现象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写过《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认为：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不过是一种无本无源的东西；今天人类迫切需要的，乃是真正的思想。

当然，我们不必随声附和后现代主义、现象学的看法。他们姑妄言之，咱们姑妄听之。例如，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那是说的西方模式的“哲学”，是德里达内心深处的某种西方中心主义在不经意之间的流露；中国自有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如《尚书·洪范》讲“明作哲”、“睿作圣”，关乎“哲”的“学”当然就是“哲学”，只

不过在中国思想中，哲学并不是最高的境界，谈不上什么“拱顶石”，儒家讲“仁且智”之谓“圣”，而哲学仅仅关乎“智”，只是“圣学”的一个方面而已。再如，哲学其实也是思想的一种形式，哲学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尽管“思想”的外延远远大于“哲学”，然而毕竟不能把哲学与思想截然对立起来。又如，哲学、形而上学固然有待于某种更为本源的思想给予“奠基”，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形而上学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当今世界、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现象学的“解构主义”那种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泛滥也是难辞其咎的。

但是，无论如何，说“中国无哲学”固然不对，这些年关于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实属无聊；然而说“中国有思想”总是不错的，例如诸子百家思想的异彩纷呈、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等等。而且，后现代主义、现象学的想法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确有一种比哲学形而上学更本源、更真切的思想而被我们长久地遗忘了，还有一些比哲学形而上学更本真、更具体而微的思想而被我们长久地遮蔽了。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思想”。《丛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样的、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既有关于“形而上者”的哲学思想，也有关于“形而下者”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等等；既有关于这些“存在者”或“物”、“有”的思想，也有关于“存在”或“无”的思想。《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关于“万物”、“有”、“无”的思想，都蕴涵在广义“四川思想家”、广义“新儒家”的思想中，等待着我们去加以更进一步的发现、发掘、研究、传播。

我希望、并相信：会有更多的这种“思想”研究成果通过《丛书》展示出来！

黄玉顺

序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

序

均强兄是研究晚清大儒、四川成都双流刘沅的专家。我多次听成都刘伯谷老先生（刘沅之孙，著名国学大师刘咸炘的长子）提起，但虽数次与均强兄以书信或电话交流研究心得，却一直未能谋面。日前，均强兄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刘沅与清代新理学的发展》一书即将付梓，他索序于我，我十分惭愧。因为，虽然曾经在萧蓬父先生的指导下，我研究了几年刘咸炘，但是，对刘沅的学术把握不深。可再三推辞，均强兄依然坚请。我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晚清学者刘沅著作等身，有著名的《槐轩全书》传世。一生从教七十年，其学会通三教，归宗孔孟，颇具思辨性，当时即有很大的名声，现有《国史馆本传》传世。刘沅在经学、宗教、医学等领域对蜀学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尤其是他创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刘门“养心功”，曾造福一方，举世瞩目，在中外学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他是一位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值得我们认真深入研究的重要人物。

刘沅的学术是一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庞大体系。要看清刘沅学术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将它置放于三教发展的历史之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熟悉三教教义与三教历史。自魏晋以来，三教历史千头万绪，三教各自的发展过程简直是云遮雾罩，要真正弄清楚，又谈何容易？刘沅研究的难点还在于，目前学界对清代学术的认知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尚且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也可以说，不知三教流变，则不能知刘沅之学所从出；不知乾嘉学术之真相，则不能知刘沅儒学之所宗。因此，研究者想要论世知人，若非青灯古佛，下一番苦功，恐怕别无出路。令人欣喜的是，正是在三教关系和清代学术这两大难题上，均强兄呕心沥血，煞费苦心，空所依傍，自出机杼，这就为进一

步探研刘沅三教合一思想的构成和宗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认为，刘沅的三教合一，就主体架构来说是儒、道会通，佛教居于次要的位置。所谓道，即道教内丹学中儒化倾向较重一派的内丹理论。所谓儒，则包括先秦儒家元典与汉、宋、明、清儒学。因为唐宋以来道教内丹学以及宋、明理学本身就包含有大量佛教因素，只是在此意义上，刘沅的儒、道合一才可称之为三教合一。刘沅的儒、道合一主要侧重于天道性命之学的合一，因为刘沅的自我认同是儒家，所以他的儒、道合一又是以儒学为主体的。至于儒学内部，虽然刘沅也兼容了汉人训诂之学，但其重心却是宋、明、清三代理学的合一。天道性命、成人成己、守身诚身，是刘沅学术思想的重中之重。就此而言，刘沅学术思想的形态应当属于清代新理学的范畴。

黄宗羲曾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天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明儒学案·发凡》）作者认为，刘沅学术思想也有一个根本的宗旨，即修身为本。用刘沅自己的话说就是“守身”、“诚身”，而具体的展开则可表述为“性与天道、以中贯之”这八个字。尽管历代儒者都论及“天”、“道”、“中”、“性”、“命”、“心”、“情”，但各家解释不同。仅就儒学而言，刘沅不仅融合了宋、明旧理学的成就，也融合了乾嘉新理学成果，而且其学兼汉、清儒训诂考据与宋、明儒“以经证悟、以悟释经”之长，因此他的学术既有一个“大”在里头，又有一个“贯”在其中。刘沅的学术思想体系，无论从天道、性命，还是伦理、宗教，都贯穿了他理解的“中道”思想，这就使得他的新理学具有了“性与天道、以中贯之”的会通特征。

众所周知，以前学界有一种成见，认为乾嘉学术是缺乏思想性的考据学，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在清初以后就基本停滞了。但是，作者通过对刘沅天道性命思想的爬梳，认为事实未必如此。该书认为，自宋以来，无论三教还是儒学自身，都存在着分流与合流两个过程。就儒学而言，气本、理本、心本三分是一方面，同时又有一种合一的倾

向。这种气、理、心合一的倾向在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它本身即孕育着气、理、心三大本体合一的可能。然而，由于清代中叶理学的实证化取向，这个过程被中断了。后出于嘉道之际的刘沅哲学，恰好延续了这个断点，建立了一种“太极函三、函三为一”的新本体论。我想，假如这个发现成立的话，则不仅对刘沅学术价值的凸显是好事，而且对我国理学史发展环节的完善也是一件好事。

伦理领域向来是历代儒学关注的重点。从汉代董仲舒构建了系统的“三纲”说以后，男尊女卑的三纲说在很长时期内维系着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秩序。作者发现，刘沅不仅对董仲舒的三纲说进行了相当系统的驳正，而且提出了“各正交通、归于自责”的礼教再造主张。同时，作者还注意到，除正三纲外，刘沅还对婚姻、妇女、宗族等礼秩问题十分关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不少接近近代伦理的平等思想。该书认为，乾嘉清儒也很关心民生和伦理，但戴震还没有明确论及三纲，钱大昕对“七出”的议论也仅只言片语，这就更显得刘沅开新礼教思想的珍贵。

均强兄的这些发现，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这对于我国古代伦理史、启蒙思想史、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之深入都极具重要的意义。当然，书中其他出彩之处尚多，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清儒钱大昕尝谓：“唯好学则不妄，唯深思则不俗”（《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赠邵冶南序》）。好学则博闻，深思则精慎。此书其庶几乎？通观全书，既有实证的细微叙事，也有独到的史学识见，资料厚实，实事求是，眼光敏锐，新义间出，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史学素养。尽管书中难免些许不足，但瑕不掩瑜。我以为，这是一部考实与史识结合得很好的鼎力之作。学问无止境，均强兄既矢志学术，诚愿他发愤努力，日后有更多著作贡献学林。是为序。

欧阳祯人

辛卯二月二十一于珞珈山麓

目 录

总 序	(1)
序	(1)
第一章 论 世	(1)
第一节 唐宋以来的三教关系	(1)
第二节 乾嘉新理学	(10)
第二章 知 人	(37)
第一节 刘沅的家世	(37)
第二节 刘沅的生平	(40)
第三节 刘沅的个性	(52)
第四节 刘沅的交友	(55)
第五节 刘沅的著作	(69)
第三章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78)
第一节 启蒙时期(1767—1780)	(79)
第二节 科举时期(1780—1796)	(90)
第三节 会通三教时期(1796—1821)	(101)
第四节 以学经世时期(1821—1855)	(159)
第四章 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	(171)
第一节 刘沅论天道	(171)

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

第二节 刘沅论性命	(211)
第三节 刘沅论心情	(225)
第五章 先天之学、静养功与遂生复性	(246)
第一节 刘氏先天之学	(246)
第二节 静养功	(276)
第三节 遂其生而复其性	(293)
第六章 开新礼教：正三纲、辨七出	(308)
第一节 正三纲	(309)
第二节 七出三不出	(335)
第三节 尊妇女、等三族	(342)
第四节 理、礼之辨	(351)
第七章 儒化佛老：刘沅的宗教观	(362)
第一节 鬼神祸福数术	(363)
第二节 邪教论	(382)
第三节 儒化佛老	(387)
第八章 三教视野下的刘沅新理学	(400)
第一节 三教会通	(400)
第二节 特立独行的新理学	(416)
附录一：刘沅经学著作提要十种	(429)
附录二：刘沅经学诗	(443)
主要参考文献	(449)
后 记	(458)

第一章 论 世

陶孟和曾说：“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所以要明白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考察他的言行，是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的。”^① 因为刘沅学术成形于嘉道之际，其学三教合一、归宗孔孟，是一种以内圣外王的新理学形态，源流十分复杂，所以，本章对刘沅学术背景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三教关系和清代理学两个方面。

第一节 唐宋以来的三教关系

唐宋以来的三教关系，大致可分为自隋唐至明末的三教合一与清代三教分门两个阶段。

三教合一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之前，既没有“三教”概念，也没有三教合一的史实。在历史上，“三教”概念最先是由佛教提出的，三教合一的史实也是佛教开创的。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伊始，就存在着一个本土化的要求。在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僧人发明了一种名叫“格义”的经典诠释方法。所谓格，就是比较、度量。所谓“格义”，就是用比较、比附的方法，用中国本土人熟悉的儒教、道教概念、理论、故事等解释佛教教义，以便于佛教的传播。正是在佛教格义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三教”概念，而且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史实。道教方面，三教合一的历史较早。据唐大潮的研究，汉魏两晋时期，道教还没有

^① 陶孟和：《随感录二十六》，《新青年》1954年影印本，5卷3号。

“三教”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三教合一过程初见端倪。隋唐五代时期，随着“重玄论”的深入和重玄学派的鼎盛，道教三教合一全面展开，然而，在整个宋代以前，道教还没有人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道教第一次打出“三教合一”旗帜的人，是道教内丹南宗创始人北宋道士张伯端。^①在《悟真篇序》中，张伯端说：“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伯端又慨叹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缙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旨要迷没邪歧，不能混而同归矣！”^②儒家方面，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已见端倪，然而儒家三教合一之说，可能最先为王通提出。王通，隋代河东郡龙门县人，深谙六经，旁及三教九流，归宗周孔执中之道，后人辑其生前言论编成《中说》一书。其《问易篇》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子读《洪范说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案：真君即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年号。建德即北周武帝宇文邕年号，二帝皆以灭佛著称。其《周公篇》谓：“《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玄虚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③王通首次以儒者身份主张三教不关世乱、三教不可废、“三教可一”的主张，他在理学史上的意义不亚于唐之韩愈、李翱。陈寅恪以“续命河汾”^④为一生梦想，非无由也。

① 唐大潮：《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论》，第96页。

② （宋）张伯端：《悟真篇序》。

③ （隋）王通著，郑春颖注：《文中子中说》。

④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第70页。

从形式上说，所谓三教合一，对于三教本身都具有两种不同的可能路径。对佛教来说，它的三教合一具有儒化、道化两种取向。对道教来说，它的合一具有佛化、儒化两种取向。而对儒教来说，它的合一则具有佛化、道化两种取向。冯友兰说：“真可为宋明道学家先驱之人，当推韩愈。”“与韩愈同时，又有李翱。”“而李之贡献，尤较韩为大。其学说所受佛学之影响，尤为显然。”“李翱及宋明道学家皆欲使人成儒家的佛，而儒家的佛必须于人伦日用中修成。此李翱及宋明道学家所以虽援佛入儒而仍排佛也。”“及至北宋，此种融合儒释之新理学，又有道家中一部分思想之加入。”“道学家中，引道教之思想入道学者，周濂溪、邵康节，其尤著者也。”^①冯先生此论较强调宋明理学的佛化，而蒙文通则较看重宋明理学的道化。蒙先生《陈碧虚与陈抟学派》谓：“图南不徒为高隐，而实博学多能；不徒为书生，而固有雄武之略；真人中之龙耶！方其高卧三峰，而两宋之道德文章，已系于一身。”^②蒙先生认为，陈抟以象学传种放，种放又以传刘牧，开先天易图学一系；以数学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开先天易数学一系；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开理学一宗；穆修又以古文传尹源、尹洙，而开《春秋》之学。而陈抟后学陈景元，也与理学颇有渊源。陈景元，字太初，一说太虚，号碧虚子。北宋建昌南城人，好道家之学，游学时遇陈抟传人鸿蒙先生张无梦，得其《老》、《庄》微旨，乃陈抟再传弟子。蒙先生谓：“伊洛所论者，碧虚书殆已有之。其异其同，颇可见学术演进之迹。其有道家言而宋儒未尽抉去，翻为理学之累者，亦可得而论。皆足见二程之学，于碧虚渊源之相关。”^③刘复生先生认为，蒙先生此文，“揭示了唐宋之际道家思想的这一重要转变。此派的影响，于宋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十、十一章。

② 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一卷，第379页。

③ 蒙文通：《陈碧虚与陈抟学派》，《蒙文通文集》第六卷，第716页。

代理学的形成至关重要。”^①

唐宋之际，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佛教宗派都曾提出过三教合一的主张。华严宗高僧宗密著有《原人论》，提倡三教合一。天台宗智圆提倡《中庸》，主张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陈寅恪指出：“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学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似亦为宋代新儒家之先觉。”^② 陈先生之义，也揭示了佛教方面道化、儒化两种取向。

刘咸炘《推十书》亦见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这种三角双向互动关系。其《内书·三进》说：“宋儒与禅家关系，谢无量《朱子学派》考之已详。中国释教中天台、华严二家，本参合道家说而成。横渠之言宇宙，整然有统，又得之华严也。至宋儒与道教关系，亦有可考。《太极图》传自道家，中寓丹道，非黄晦木之创说。袁清容（桷）集《答问》亦云：《太极图》确自陈抟传下，二空圈乃成人成仙之说。又濂溪有《咏阴仙丹诀》诗，在四川丰都平都山。其文曰：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作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后更知微。眉山杨栋得之于乱碑中，官合阳时作也。其《拙赋》中亦有道家语。康节之学，本传自希夷。谢上蔡作《晁以道传易堂后序》，谓康节受《易》于庐山老浮图，康节书亦引《参同契》。吕新吾尝云：明道受用处阴得之佛老，康节受用处阴得之庄、列，然作用自是吾儒。”^③ 又云：“南北朝老学渐盛，佛学以入，学者稍稍和会老佛以言儒道。然止辨名理，未求实功。宋之儒者更进于此，而和会老佛则同。盖四子书文

① 刘复生：《通观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蒙文通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集》，第 119 页。

②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③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貳），第 786 页。